戲劇研究　第27期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021年1月　頁1-36
DOI: 10.6257/JOTS.202101_(27).001

圓明園「同樂園」三層戲樓建立新考*

彭秋溪
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前言

清人入關之後，在順治一朝，內廷即存在演戲活動，如世祖招教坊司人員入內演唱《讀離騷》，其事見於尤侗《讀離騷》劇自序。但其時尚屬小型演出。至康熙一朝，舊籍載錄則有聖祖命梨園演「目連傳奇」之事，其事見董含《蓴鄉贅筆》。但僅以臨時搭臺作演。而世宗雍正一朝，雖未見明文記錄當時內廷演出連臺大戲，但學界或因圓明園「同樂園」此時已經出現，便認爲當時內廷不僅有小戲臺演戲，而且已出現「三層」大戲臺——所謂「同樂園」三層大戲樓。

但筆者以爲，目前關於同樂園「三層」大戲樓建立時間的看法，疑竇頗多，而與其相關聯的議題，又非常重要，因而有必要一一釐清，況且目前學界對同樂園「三層」大戲臺的建設史尚無系統、專門的研究，因此，本文依據新見清代內廷相關檔案，對其作系統的考察，以期推進清代內廷演戲史方面的研究。

一、乾隆二年《活計檔》中的「同樂園」戲臺信息新解

此前由於相關文獻的不足徵引，諸如清代「同樂園」三層戲樓這類「大臺」始見於何時，研究界說法不一。而這些說法中，又以將所謂的「同樂園三層大

*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編號：18CZW030）、廣東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GD17YZW01）階段性研究成果。本文撰成後承蒙黎國韜教授、汪詩珮教授，以及本刊匿名審稿專家提出寶貴修改意見；英文摘要承蒙本刊特聘Davis教授潤飾，謹此一併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看作清代首座三層戲臺爲最典型。或以爲其大概建於乾隆間，又或認爲其出現在雍正朝，各存己見。持「乾隆朝」一說的，如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根據朝鮮大使柳德恭《灤陽集》所記乾隆五十五年在圓明園同樂園觀看大戲，以爲同樂園大戲臺建於乾隆後期。[1]與此相似，羅德胤《中國古戲臺建築》在介紹清代大戲樓時，則謂「修建年代最早的可能是圓明園同樂園（三層大戲臺）」，並引劉敦楨《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的判斷——「同樂園當建於乾隆早期」，而傾向將同樂園三層大臺的建立也定於「乾隆早期」這個模糊的時段。[2]主「雍正朝」之說的，則如丁汝芹《清代內廷演戲史話》認爲同樂園戲臺「大約建於雍正初年」[3]，而楊連啓《清末宮廷承應戲》則具體地指明「同樂園戲臺應始建於雍正四年」[4]。

在這兩說之外，還有一種較爲「折中」的提法，如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援引翟小菊《德和園戲臺研究》，以爲同樂園大臺建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年（1726-1737）。[5]此外，值得關注的，還有「建於乾隆十九年」之說，如劉玉文《濃縮天地：避暑山莊營造技藝》一書認爲「同樂園」、熱河三層大戲臺都建於「乾隆十九年」[6]，梁憲華《清宮大戲臺的戲劇演出》、《乾隆時期連臺本大

1 參見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40；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頁241。

2 羅德胤：《中國古戲臺建築》（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52。按，劉敦楨《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一文，並未談及同樂園大戲臺的創建時間，也未明言「同樂園」建於乾隆早期。參見：《劉敦楨文集》（一）（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年），頁291。

3 參見丁汝芹：《清代內廷演戲史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頁67；丁汝芹：《清宮戲事：宮廷演劇二百年》（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年），頁52。但其《清代內廷演劇始末考》（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年），又謂同樂園三層大戲臺建成於「乾隆朝」（頁37、49）。

4 楊連啟：《清末宮廷承應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2年），頁181。按，楊連啟後在《清代宮廷演劇史》仍持此論，並認爲清代宮廷三層大戲臺興建的先後順序爲：圓明園的清音閣、寧壽宮的暢音閣、紫禁城壽安宮戲樓、熱河避暑山莊清音閣、頤和園德和園戲樓。誤。參見楊連啟：《清代宮廷演劇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年），頁212、214。又，或僅曰同樂園三層大臺建於「雍正朝」，如郭黛姮：《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年），頁121。

5 參見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39。

6 參見劉玉文：《濃縮天地：避暑山莊營造技藝》（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戲演劇的宮廷化特色》二文也提及「同樂園建於乾隆十九年」[7]，但均未見相關依據，僅一筆帶過而已。

要之，關於「同樂園」三層大戲樓的建設時間，均無實據，因此論而不定，莫衷一是。[8]由於種種原因，研究界長時段無法推進這一方面的研究，舊有的說法，也因此被繼續引用在目前的相關著述中。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們較爲系統地考察以上這些說法，則會發現：將同樂園視爲「三層」大戲臺的發源地，並以爲三層大臺創製於雍正間的看法，多與一九八六年楊乃濟發表《圓明園大事記》一文有關。楊氏《大事記》在「雍正四年」條下記曰：「八月，活計檔內首次出現『同樂園』及『鋪面房』字樣。由是知『同樂園』及『買賣街』當時均已建成。」此中所謂「活計檔」，是當時尚未向外界披露的《活計檔》原檔。而楊氏考慮到「一切照依原文，僅各款下加註的檔案出處予以略去，因檔案原文尚未印行刊佈，加註這些出處索引並無實際意義」，因此沒有在此條下標明史料的出處。但《圓明園檔案史料選編》一書一時難以出版，[9]故筆者以爲，學界推測「同樂園」首次出現的時間的依據，應多是從楊氏《大事記》而來。

按照楊氏的推想，「同樂園」字樣既然見於檔案，「由是知『同樂園』及『買賣街』當時均已建成」。由此，學界或據此認爲三層式的「同樂園戲臺」也在此年建成（或始建於此年）。[10]至於學界或認爲「同樂園」大戲臺建成於乾隆

---

7 按，此處「同樂園」當指作者所謂「清音閣大戲臺」。分別參見中國紫禁城學會編：《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六輯，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頁463-464；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十年論文選（2005-2014）》（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年），頁613。

8 又如俞健《清宮大戲臺與舞臺技術》（《藝術科技》1999年第2期，頁8-16）一文關於清音閣的建設時間，亦只是提及雍正四年。但俞文同時又云：「另一說，同樂園大戲臺建於乾隆十九年（1754）。」不知其所據爲何。

9 楊氏《大事記》前言謂：「自1980年開始，由當時的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理論與歷史研究室（今中國建築技術發展中心建築歷史研究所）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作，共同編輯《圓明園檔案史料選編》一書，歷時四年，現該書已經脫稿，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筆者作爲這項選編工作的參加者，曾就該書選材輯成《圓明園大事記》一篇作爲附錄，輯入該書卷尾。《大事記》之取材僅限該書收錄之檔案，照依朝年月份先後排列順序，共計一百六十六款，並於個別條款下添了一些按語。《圓明園檔案史料選編》一書雖已發稿，但出版發行尚待時日，而許多致力於圓明園研究的同志，都有盡快知悉該書主要內容的渴望，敬啓爲此特將《圓明園大事記》先予刊發。」所謂《圓明園檔案史料選編》，應即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此書末尾即附錄有「圓明園大事記」。

10 這一說法，直至近年仍爲部分研究者所持立。如張衛東《賞花有時度曲有道：張衛東論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初年，則是根據《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一書所收《活計檔》「油漆作」的記錄得來的：

> 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將圓明園同樂園舊有匾額字樣「景物常新」，石青地金字對聯字樣「樂奏鈞天玉管聲中來鳳舞，音宣廣陌雲璈韻裡叶衢歌」木架紅紙墨字繕寫字樣摺片一件持進，交太監毛團、胡世傑呈覽。奉旨：匾另見新收拾，其對聯仍用舊字樣，照重華宮戲臺上對字樣式做。欽此。於本月十五日，催總白世秀來說，內大臣海望交圓明園同樂園戲臺上大匾一面，小匾三面，對字一副，著造辦處成做。欽此。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將做得同樂園戲臺上匾四面、對一副，催總六達子持去安訖。（油漆作）[11]

此事發生在乾隆二年十月初一日，即所謂「見新同樂園戲臺匾額」之事。由於這條記錄出現了「同樂園戲臺」、四面匾等信息，因此學界或據此認定該戲樓就是所謂的「同樂園」三層大戲臺，並謂其建成於乾隆初年（或乾隆二年）。由此，它也成爲部分研究者提出同樂園戲臺修建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年」看法的「淵藪」。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在標點這條史料時略有疎誤，誤將「繕寫字樣摺片」與「木架紅紙墨字」連讀，這不僅致使後面的「木架紅紙墨字」的描述與「石青地金字」有所矛盾，也因此導致讀者無法準確地從這則史料獲取此時同樂園「舊有」匾額、對聯的款式信息。而這又直接關係到同樂園戲臺的建設史問題（見後文）。實際上，若作比較合理的釋讀，筆者以爲，該史料應作如下標點：

> 初一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將圓明園同樂園舊有匾額（字樣「景物常新」，石青地、金字）、對聯（字樣「樂奏鈞天玉管聲中來鳳舞、音宣廣陌雲璈韻裡叶衢歌」，木架、紅紙、墨字）繕寫字樣摺片一件持進，交太監毛團、胡世傑呈覽，奉旨：匾，另見新收拾。其對聯，仍用

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64-65）：「清朝的第一座三層大戲臺就是在雍正四年建造，地點在圓明園的同樂園清音閣，這座建築爲後世所造三層大型戲臺積累了營造經驗」；常欣：《紫禁城內的戲臺》，《紫禁城》2013年第11期，頁34；郝成文、張義：《圓明園戲臺考》，《北京檔案》2019年02期，頁53。

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249-12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舊字樣，照重華宮戲臺上對字樣式做。欽此。於本月十五日，催總白世秀來說，內大臣海望交圓明園同樂園戲臺上大匾一面、小匾三面、對字一副，著造辦處成做。記此。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將做得同樂園戲臺上匾四面、對一副，催總六達子持去安訖。（油漆作）[12]

由此可知：首領、催總呈遞乾隆的是一份摺片。摺片上書寫有同樂園戲臺上舊有匾額、對聯的文字（所謂「字樣」），並在摺片上的字樣下，標明它們舊有的款式（如「石青地、金字」、「木架、紅紙、墨字」），以供乾隆參考、定奪。而不是指將舊的匾額、對聯撤下來，連同繕寫匾、對文字的摺片一並呈閱於高宗。

如此，則「石青地」，是指舊匾額底色，而非對聯的底色；「金字」，是指舊匾額文字顏色。相應的，「木架、紅紙、墨字」，則指舊對聯的款制——木架子、紅色紙張、墨筆書文。換言之，這些款式信息，應該是薩木哈等人在摺片中的輔助性描述，而不是指把同樂園戲臺上的匾、對用這種款式做好「樣子」（即「樣本」）進呈御覽。不然「將……繕寫字樣摺片一件持進」的句式無法被理解。況且，「油漆作」是內務府「造辦處」下面專門負責物品油漆事項的作坊，承擔的是舊有物品的油漆修復、新物品之半成品的補漆工作，並不承擔拆卸匾對之事。

根據摺片上所描述的舊匾對字樣、款式，清高宗作出了指示，因此接下來才有「本月十五日，催總白世秀來說，內大臣海望交圓明園同樂園戲臺上大匾一面、小匾三面、對字一副，著造辦處成做」的敘述。可見薩木哈等人當時交給太監的，的確是一件繕寫匾、對文字的摺片。

至此，我們便清楚地知道，此時（乾隆二年十月）同樂園戲臺上舊有的匾額，其匾底顏色是「石青」，匾文「景物常新」四字則以金水書寫而成；而舊有的對聯，則是以紅紙、墨筆書寫，再以木架裝固。而乾隆帝也並未更換戲臺上舊匾額、對聯的文字，只是諭令分別將其「見新」（翻新）、「照重華宮戲臺上對字樣式做」。

[12] 按，本文所引《活計檔》中的戲曲史料，除作特別說明以外，均引自彭秋溪編著：《清代內務府〈活計檔〉中的戲曲史料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預計2025年出版），後文不一一出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圓明園四十景圖》中的「同樂園戲臺」建於雍正間

如上所述，薩木哈等人呈遞御覽的摺片上，僅僅寫明「景物常新」匾名、「樂奏鈞天」對聯的文字、款式，而海望則從戲樓上拆下了四面匾、一副對聯。這除了表明當時「同樂園」戲臺上懸掛有四面舊匾之外，還表明這舊有的四面匾，在材質、文字風格方面應該相同（僅存在尺幅大小不一而已），因此薩木哈等才只描述其中的一面匾額，以代其餘三面。遺憾的是，其餘三面匾額的文字信息、懸掛位置，也因此被省略。

如果單單從這個戲臺上舊有的「四面」匾額、一副對聯來看，我們會比較自然地聯繫起現存的清代三層大戲樓的匾、對情況，以爲這條史料中所謂的「同樂園戲臺」，是三層大戲臺。目前爲止，研究界也的確存在這種看法：或以爲乾隆初年同樂園戲臺已經是三層，或曰「外顯三層簷」[13]而實無三層空間。前者如郭黛姮《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認爲，「從樣式房圖檔和《圓明園四十景圖》[14]看，戲樓三層、三開間、平面見方、歇山頂，其後所帶的扮戲樓爲二層、五開間、懸山頂。」[15]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遠逝的輝煌》所用雷氏樣式房圖檔，實爲道光間圖檔狀貌，但自乾隆二年至四十五年間，「同樂園」建築（包括戲臺）已經過多次改建，它顯然不能完全準確地反映出乾隆初年「同樂園」戲臺的形制，甚至不能如實反映《圓明園四十景圖》中「同樂園」戲臺的形制。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後者則如張龍等人，根據乾隆六年至九年內廷畫師奉敕繪製的《圓明園四十景圖冊》中「同樂園」相關建築形制，具體而微地指出：《圖冊》「極具寫實風格」，此圖中的同樂園大戲樓，「也應爲雍正間所創建的格局與形象」，是「外

---

13 張龍、吳晗冰、張芝明、張鳳梧：《圓明園同樂園清音閣戲樓鈎沉——兼論清宮三層戲樓的空間使用特徵及其成因》，《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9期，頁56。

14 按，《圓明園四十景圖》計有絹本工筆、墨線白描兩種版本系統。前者今存乾隆九年（1744）繪本（四十景圖詩），後者有乾隆十年內府刊朱墨套印《御製圓明園圖詩》附圖本、張若靄乾隆十一年繪《御製圓明園圖詩》並書乾隆所作四十景詩、光緒十三年（1887）天津石印書屋石印《御製圓明園圖詠》、大同書局石印《御製避暑山莊、圓明園圖詠》之「圓明園圖詠」。其中，石印本摹自內府刊本。詳情參考李雪：《圓明之德——〈圓明園四十景圖〉研究》「序言」第一節（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4年）。

15 所謂「樣式房圖檔」，即指清代雷氏家族所存清宮苑園建築相關繪圖文檔，此處具體指「同樂園」雷氏圖檔。參見郭黛姮：《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頁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顯三層簷」的大戲臺：

> 仔細辨別此時的同樂園戲樓及其周邊建築，不難發現該戲樓第三層簷下空間低矮，柱間爲橫披窗，與同治朝重修燙樣，以及德和園大戲樓、暢音閣三層的擎簷廊做法不同，雖其外顯三層簷，內部並無三層空間可用；扮戲樓面闊五間卷棚懸山頂，不同於後期圖像材料中的歇山頂；戲樓南側的後樓，面闊三間，與後期圖像材料中的九間明細不同。[16]

這是目前筆者所見研究界討論「同樂園」戲樓特性方面的最新判斷。但，這是否眞的意味著此時的「同樂園戲臺」已然是「外顯三層簷」的大戲樓？筆者以爲，這個最新的判斷也是有待商榷的。我們不妨先考察《圓明園四十景圖冊》（後文或簡稱「《四十景圖》」）中「同樂園」戲臺的修建時間。

據雍正四年八月初五日內務府造辦處下屬機構「銅作」的記錄，當時「同樂園」正殿（即所謂的「看戲殿」）似乎已經竣工，這是學界所熟悉的史事：

> 圓明園來帖，內稱：總管太監陳久卿傳：鋪面房、同樂園淨房內爐上，著配做紅銅絲爐罩，高四寸、口面三寸五分一個。記此。於本月十八日，照尺寸做得紅銅絲爐罩一個，首領太監程國用持去，交總管太監李德收訖。（銅作）[17]

迄今爲止，它是我們從已知文獻中所能見到「同樂園」這個名稱的最早出處。這條記錄中，「淨房」是指放置帝后所用便溺設備的小房間，也即現今所謂的廁所、「洗手間」。而「淨房」作爲一種較爲特殊的起居設施，與「鋪面房」、「同樂園」同時出現在「銅作」的記錄文檔中，而且僅要求對其中的「爐」子稍作改造，沒有提及同樂園中的其他物件或設施，這顯然表明「同樂園」的整體建築，至少應該接近完工的狀態，也因此，「銅作」在此處使用了「收訖」一詞，而不是「安訖」的字樣。儘管我們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此時同樂園是否已經修建有戲臺（即以園名來稱呼的「同樂園戲臺」），但這足以提示我們：乾隆初年繪製的《四十景圖》中的「同樂園」戲臺，可能建於雍正年間。

不過，這種提示之外，不能忽略的是，乾隆元年三月初十日，圓明園「輿圖房」尙在爲同樂園的建築呈報「地盤樣」：

---

16 張龍、吳晗冰、張芝明、張鳳梧：《圓明園同樂園清音閣戲樓鈎沉——兼論清宮三層戲樓的空間使用特徵及其成因》，頁56。

1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頁11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委屬司庫八十、柏唐阿郝申、七十九來說，內大臣海望交：勤政殿地盤樣一張、同樂園地盤樣一張、長春仙館地盤樣一張，著照樣做燙胎合牌房樣。記此。於本月二十八日，委署司庫八十將做得合牌燙胎房樣三件持去訖。[18]

「地盤樣」，即相當於今日所謂的「平面圖」。這似乎表明：「同樂園」裡面的建築與「勤政殿」、「長春仙館」等建築群一樣，當時尚在擴建或改建規劃中，故有「著照樣做燙胎合牌房樣」的諭令。

但即便如此，筆者認爲，這並不意味著《四十景圖》中的「同樂園」戲臺建於乾隆初年，所謂「著照樣做燙胎合牌房樣」，也只能理解爲乾隆帝當時尚在謀劃改建「同樂園」中的部分建築，而非全部建築，因爲乾隆朝在改建康、雍以來的圓明園各處殿宇時，並非全盤重新修建，而多是部分改建，[19]何況此時「輿圖房」處於製作被改建房屋之房樣（房屋模型）的階段。根據前面所引「油漆作」的記錄，乾隆二年十月諭令見新「同樂園戲臺」匾對，至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催總六達子便可持去「安訖」，「安訖」二字顯然表明同樂園戲臺在此之前已經竣工。另外，「油漆作」稱同樂園戲臺上的匾額、對聯爲「舊有」，且其中的四面匾額只是「見新」，眞正要成做的只有對聯，故所花時間，不過兩月有餘（自本年十月至十二月），此事就辦妥。若此處的「同樂園戲臺」建於乾隆元年，則此時不過一年多而已，不應「見新收拾」匾額、改換對聯款式。不但如此，清高宗還要求以「重華宮戲臺」上對聯的款式，作爲同樂園戲臺對聯製作的參考標準（只保留字樣不變），而重華宮戲臺的建成，乃在乾隆三年五月，[20]同樂園戲臺如果也修建於乾隆初年，更不應出現這種明顯的審美差異。因此，「舊有」一詞，只能說明「舊」匾對的製作時間並不短。也正因爲如此，同樂園戲臺「舊有」的對聯款式，在乾隆看來，相較於本朝製作的其他御筆匾、對，難免過於簡陋。

此外，《活計檔》載記清高宗所書匾對，均稱「御筆」，無一例外。這種情況甚多，茲列乾隆初年幾處，以作典型。如「乾隆二年八月初二日，筆帖式海福

18　同前註，頁1244。

19　按，這種情況可從現今所存乾隆中後期到道光間雷氏圖檔上存有多次修改得到說明。參見國家圖書館編著：《國家圖書館藏樣式雷圖檔：圓明園卷初編》第五函（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

20　參見王子林：《乾隆潛邸改建考》，《故宮學刊》2010年（總第6期），頁183-2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交來御筆『黼黻昇平』雙鈎油紙匾文一張、御筆『瑞景瓊樓開錦繡，歡聲珠閣奏雲韶』雙鈎油紙對文一聯」；又如「（乾隆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首領鄭愛貴交出御筆絹字橫批一張、御筆絹字對聯一副」；再如「乾隆八年四月初八日，首領夏安來說：首領開其里交御筆『山水清音』本文一張（在香山行宮向南戲臺上簷前掛）」。同樣是戲樓匾、對，薩木哈等人稱同樂園戲臺的匾對爲「舊有」之物，而不稱「御筆」，若「景物常新」等匾對出自乾隆之手，則不該出現這等稱呼。因此，至少「景物常新」等匾對，當出自雍正朝侍臣之手，而非雍正、乾隆之手。

這不僅說明同樂園戲樓不建於乾隆朝，也與圓明園若干匾對出自大臣手筆的事實相合。如乾隆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油木作」記錄，當時「熙春園」內有「康熙御筆四面、福字二個，乾隆御筆匾一面，其餘各色匾二十五面，大小字畫掛屏十八個、紙福字三個……奉旨：御筆匾文，造辦處收拾見新，其餘匾對亦交造辦處，應做材料者做材料。……做材料用：舊破漆木各色匾二十五面、各色木胎對十六副……」這其中很值得注意的是，「舊破漆木」匾額、「各色木胎」對聯，恰與同樂園戲臺所掛舊有對聯的款制相同；無獨有偶，雍正間存在將御筆對聯用杉木架子裝固懸掛的事實：

> 雍正六年六月初三日，太監王璋交來御筆「麥翻千傾浪，魚躍半池珠」對一副，說首領太監李統忠傳旨：將此對成做，掛在酒館內。欽此。於六月十一日，將御筆對托裱完，貼在杉木胎對架上，隨黃銅托釘四個、吊鑲二個，郎中海望帶領催白世秀持至酒館內掛訖。（裱作）

雍正此處御筆以何種質地的紙張書寫，檔案中沒有載記，但「貼在杉木胎對架上」云云，顯然與「木架、紅紙、墨字」是接近的。

另外，同樂園大戲臺上的匾額之一「景物常新」，除了見於前文所引外，筆者尚見其於乾隆三年「裝修處」的檔案中。該史料爲研究者所少見，茲全引如下：

> 乾隆三年二月初八日，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同樂園戲臺上「景物常新」匾字歪了，俟蓋樓時，另行鈎做收拾。欽此。於本月二十日，同樂園戲臺上「景物常新」匾字收拾好訖。（裝修處）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據上文所述，「景物常新」等舊匾對，見新之後，安掛於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個多月之後，即乾隆三年二月初八日，清高宗便給出「匾字歪了」的指示。這表明：應該是文字歪了，而非整塊匾額掛歪了；「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做」，應指採用「雙鈎」法重新製作；「匾字收拾好」，即：將匾額拆下存放好（以待重新鈎做）。聯繫前文所引乾隆元年「輿圖房」進呈同樂園、長春仙館等地盤樣，則此處「俟蓋樓」，當指計劃修建同樂園內其他樓殿，故在十餘日之後就能將「匾字收拾好」。而「收拾好」，應即將匾額撤下、入庫存貯。需要提醒的是，「裝修處」並不承擔造建樓宇的工序，只承擔建築物的裝修工作。這與前文所考此時同樂園戲臺已然竣工的事實也相符合。

需要略作說明的是，稍早於同樂園戲臺「景物常新」匾對的收拾，乾隆帝已諭令將南府戲臺的匾對進行換改，並且將「雙鈎」法應用其上，如：

> 乾隆二年八月初二日，筆帖式海福交來御筆「黼黻昇平」雙鈎油紙匾文一張、御筆「瑞景瓊樓開錦繡，歡聲珠閣奏雲韶」雙鈎油紙對文一聯，奉莊親王諭：著交養心殿造辦處成造匾對，得時，在南府戲臺上懸掛，遵此。……（油漆作）

由上可知，乾隆二年十月初一日、三年二月初八日對同樂園戲臺上舊匾、對進行調改，並不意味著《四十景圖》中同樂園的戲臺竣工於乾隆初年。因爲將舊有的匾、對進行翻修，不過是乾隆繼位後對圓明園等處皇家建築做出調改的一種方式而已：據史料所載，高宗登基不久，就對宮中各處匾對進行調整、更換。[21]不但如此，根據內廷檔案的記錄，乾隆御極不久，還命令宮廷畫家將圓明園各處殿宇每處繪畫一張，最後匯總成一張（即所謂「通景畫」），此事在乾隆元年正月，八月繪成；[22]同年正月，又將「圓明園舊蓮花舘處所掛」的「長春仙館」匾額，按照新款式改做。這樣的情況，還有多處，茲不贅舉。[23]這裡要說明的是，前文

---

21 下文所引乾隆元年十二月統計圓明園各處匾名，間接原因，還可能是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地震之後圓明園等處皇家建築遭到嚴重破壞，此後雖然陸續重建，恐怕仍不能一時完備，故清高宗繼位不久便諭令太監蘇培盛將圓明園各處匾名作一次統計，以便其做出新的安排。而從上文所引乾隆帝的指示看，其中一摺所列的三十二面匾，似乎都屬於地震後之物，不知出於何因，乾隆諭令園內人將此三十二面收藏於圓明園庫內。而另外一摺中所列的一百四十四面匾，雖然不知道是圓明園哪一區域的匾額名，但顯然是雍正朝已經定好的匾名。故高宗提出「若有匾」，就收拾好，仍舊懸掛原處（原定掛某匾之處）。

22 參見《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下冊），頁1243-1244。按，此「通景畫」今未見。研究者或稱今法國巴黎博物館藏有由唐岱、沈源、郎世寧合作的進呈於乾隆二年的圓明園「通景畫」一張。參見王道成：《概說圓明園四十景探微》，《圓明園》學刊第18期，頁12。

23 更換匾名、款式的例證，分別參見：《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下冊），頁1246、1251、1253、12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引內監薩木哈等人的匯報，即與清高宗登基後對圓明園所有匾額作調查、更換的舉措直接關聯：

> 乾隆元年十二月初二日，宮殿監督領侍蘇培盛交圓明園各處匾名二件（一摺內匾三十二面，一摺內匾一百四十四面），傳旨：著將一摺內之三十二面，在圓明園庫內收貯；一摺內匾一百四十四面，若有匾，收拾，仍在原處懸掛，如無匾，即照摺內匾名成造。欽此。
>
> 於乾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圓明園寫過未做之匾七十二面造匾做法紙樣五十張持進，交毛團、胡世傑、高玉呈覽，奉旨：梧桐院內所掛之匾四面，准做「碧桐書院」匾一面，其餘三面不必做，嗣後梧桐院改爲碧桐書院，其餘具照匾樣上選定匾樣做。欽此。
>
> 於乾隆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司庫劉山久將做完之匾持進、懸掛訖。[24]

又，據「油漆作」乾隆二年二月初二日的記錄，這一百四十四面匾似乎都沒有成造出來，尚只有匾名而已：

> 懋勤殿首領夏安來說，宮殿監督蘇培盛交御筆絹本文七十二張，傳旨：著做匾額七十二面，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
>
> 於本年四月十七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畫得匾樣一百四十四張[25]交太監毛團、胡世傑、高玉呈覽，奉旨：內准七十二張樣。欽此。[26]

很顯然，清高宗只批准了七十二面匾。這裡所統計的，都是匾額，「同樂園」戲臺上的匾、對既然都是「舊」的，自然不在這「七十二」面乾隆御筆新匾中。據此可知，早在乾隆元年，清高宗即命蘇培盛等人清查圓明園各建築及其匾對，然後才有「若有匾，收拾，仍在原處懸掛」等指示。而薩木哈等人將同樂園戲臺上的匾對繕摺呈覽，也正是執行清高宗此諭令。可見，同樂園戲臺匾、對的見新，只不過是高宗新舉措中的一個例子而已。但這恰恰都說明：「同樂園」戲臺在乾隆元年之前已然存在，故而在乾隆二年十二月，將翻修好的匾對安掛於戲臺上。

與此相關聯，今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定稿於乾隆九年的《圓明園四十景圖》中，與「同樂園」相毗鄰的「坐石臨流」景區尚未完全竣工。這可從「坐石臨流」中部分屋頂瓦片的苫蓋狀況，清晰地看出（見圖1）：

---

24 《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下冊），頁1246。

25 案，此「一百四十四」當是「七十二」面匾的匾樣，即每面做法紙樣二張。

26 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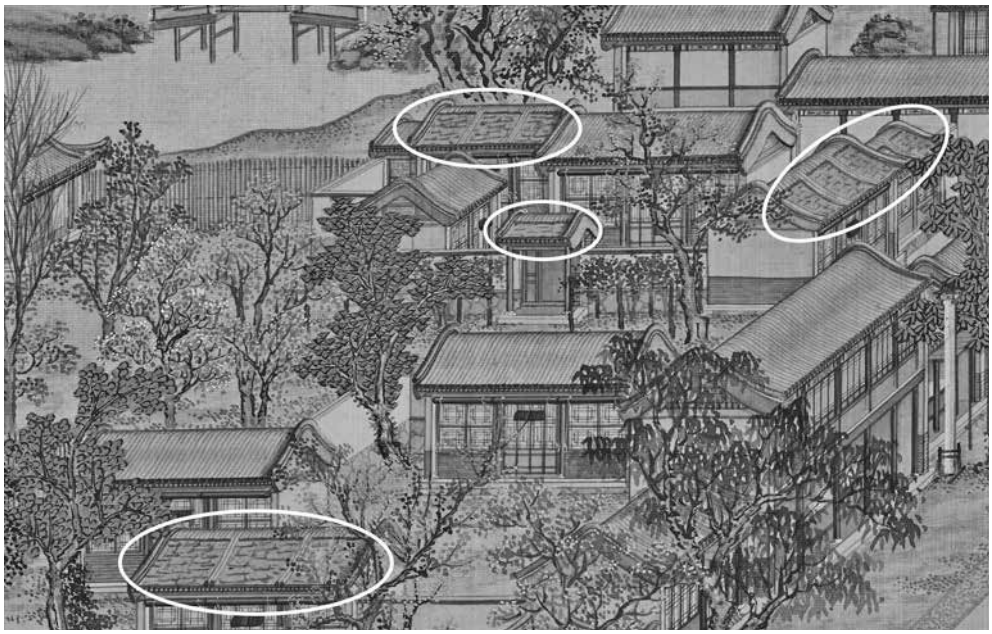


圖1，絹本《圓明園四十景圖》之「坐石臨流」局部[27]

如圖中白色橢圓所圈示，「坐石臨流」景區內的一些建築頂上，瓦片尚在加蓋中。而在其東邊的「同樂園」建築群，則不存在這種景象。這顯然說明：至遲在乾隆九年定稿《四十景圖》時，「同樂園」工程已經建設完畢（包括乾隆元年按照「同樂園地盤樣」加蓋、翻修的工程，如上文所引《活計檔》）。

總之，爲繼承雍正以來陸續興建圓明園的意志，也爲了展示自己作爲新一代君主的志向，清高宗幾乎對圓明園所有景區都作過調研，添減、修改其中的建築、佈設，更是順理成章。由此，建於雍正朝的「同樂園」戲樓，自然也在乾隆帝審視的視線之內。出於個人性情，乾隆帝對園中設置的物項無不追求盡善盡美，多次將他認爲「俗氣」、「糙」的舊物品，下令重做或改做。而同樂園的「舊」對聯，乃是「木架、紅紙、墨字」，這不僅表明該對聯的款制絕非乾隆帝審美標準下的產物，[28]也表明乾隆三年五月竣工的重華宮戲臺，成爲體現乾隆審美水準的佳作，也成爲同樂園戲台匾對參考的標準。

27 絹本《圓明園四十景圖》今藏法國國家圖書館。本文轉引自該圖書館網公佈圖。後文不再註明。

28 筆者所見《活計檔》中所記乾隆朝製作的匾對中，未見有以「木架、紅紙、墨字」的材質、形制成造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前文所述，早在乾隆元年，清高宗即命內廷繪畫人冷枚將圓明園繪成「通景畫」，可惜此畫至今未見，爾後高宗又命冷枚起稿圓明園相關圖景；乾隆三年則諭令沈源負責畫「房舍」、唐岱負責畫「土山樹石」，以分景圖的形式完成全園景點的繪製，並於乾隆四年繪成四十頁圖，裱成二冊進呈，這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現「四十」幅圖的記載。[29]乾隆六年三月、九年九月，兩次將已有的「四十」頁絹畫中的六張，替換成「方壺勝境」等三張、「安佑宮圖」等三張，[30]仍爲「四十」之數。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坐石臨流」及其東邊的「同樂園」，早在乾隆四年，即已進入「四十景圖」，而且乾隆六年、九年兩次替換畫頁都未曾將之剔除，至乾隆九年定稿，四十幅中仍舊有「坐石臨流」及「同樂園」。雖然此時「坐石臨流」尚未完全竣工（如前所述）。換言之，從乾隆三年至乾隆九年，期間雖然幾次更換某一景區畫頁，但目前我們所見的乾隆九年定稿的四十景中，「同樂園」中的戲臺建築，仍舊是「舊有」的模樣。這足以表明，至乾隆九年，「同樂園」中的戲臺一直保持著原有的建築面貌。

三、《圓明園四十景圖》中的「同樂園戲臺」非三層

考察清楚《四十景圖》中同樂園戲臺的建設時間之後，我們再看其構造是否爲三層。

如前文所揭，張龍等人認爲《四十景圖》中「同樂園」戲臺是「外顯三層簷」而實無三層舞臺，並在文章中以圖片標示的方式加以說明（見圖4，圖中白色圓圈爲原文作者所施），指出該戲臺背後的柱間壁板，爲「橫披窗」。如圖所示，戲臺背後的壁板確實爲「橫披窗」。但，筆者以爲「雖其外顯三層簷，內部並無三層空間可用」的說法，仍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爲，通過考察戲樓在該圖中的比例、「清音閣凱宴將士圖」（圖2）[31]「阮光顯入覲賜宴圖」（圖3）[32]二圖戲樓的比例，以及《活計檔》中的相關記載，其實我們可以確定《四十景圖》中

29 相關情況，參見李雪：《圓明之德——〈圓明園四十景圖〉研究》第一章第一節。

30 同前註。

31 參見北京「故宮博物院」網：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3337.html，查閱日期：2020年10月7日。

32 轉引自葛兆光：《朝貢、禮儀、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易服色說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2期，頁1-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樂園」內的「戲樓」，實屬「重簷單層」[33]戲臺，並非「外顯三層簷，內部並無三層空間」。



圖2，「清音閣凱宴將士圖」



圖3，「阮光顯入覲賜宴圖」

其一，據絹本《四十景圖》之「坐石臨流」圖、詩（圖5），可知該圖中右邊院落形式的建築，確實爲「同樂園」。所謂「東爲同樂園」，即指圖中西北方向以亭子及山泉爲代表的「坐石臨流」景區之東，即是「同樂園」。如圖所示，二者之間隔著所謂「買賣街」，街北爲「舍衛城」。我們通過觀察《四十景圖》中所有建築的繪製手法、比例，包括「坐石臨流」、「同樂園」裡面的建築比例（圖6），可以判斷：「同樂園」戲臺的高度，其實與其前後左右的建築高度相去不遠，均爲兩層高，且非「外顯三層簷」。



圖4，張龍等人文章所示



圖5，絹本《圓明園四十景圖》畫冊中的「坐石臨流」分景圖

[33] 按，「重簷單層」，謂戲樓建築爲兩層，上層在乾隆初期的檔案中，多稱之爲「天花板」（如乾隆三年新建的重華宮戲樓——今漱芳齋院落戲臺，起初並沒有設置地井、天井，至本年十月、十二月方先後開設。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8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99-100），將天花板改做「天井」，上層主要用來安置井架、轆轤等機械設備，以及演員偶爾由此下到地面層。因此，這種戲樓實際用來表演的舞臺主要爲地面層。由此，學界或謂之「重簷單層」戲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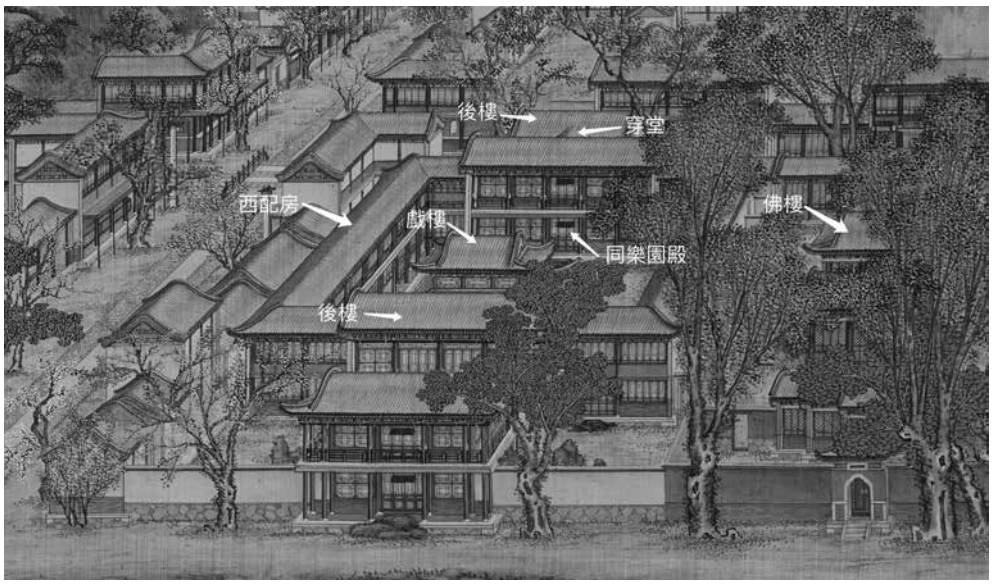


圖6，絹本《圓明園四十景圖》中「同樂園戲臺」與周圍建築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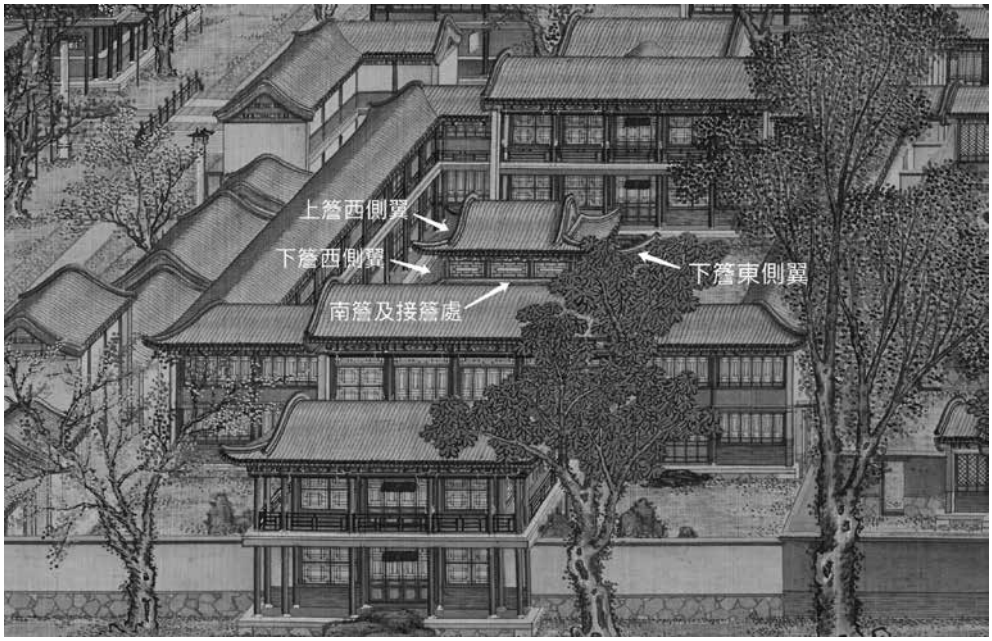


圖7，絹本《圓明園四十景圖》中「同樂園戲臺」某些部位特徵

圖7中南側箭頭所指的那一條略呈灰白的橫線，即爲「橫披窗」下露出的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層南簷與閣樓的連結處：戲臺高度與園子東西兩邊的廊房基本齊平——略低於其北方的看戲樓（五間，兩層），而略高於其南面所謂的「扮戲樓」（五間，兩層）。而與此相關，「乾隆年間」[34]所繪同樂園平面圖，顯示出與《四十景圖》的相異之處，如戲臺南面的樓房位置、房間數量，二者並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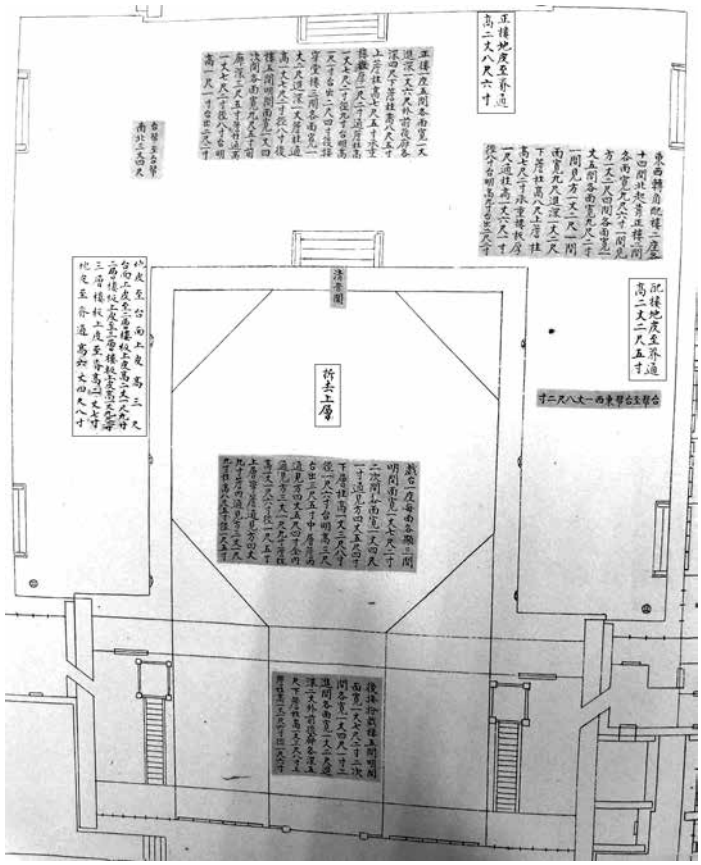


圖8，乾隆間同樂園平面圖，局部[35]

對比圖7、8，很顯然，圖8中戲臺後面的建築位置已向南擴移——圖7戲樓南面的五間倒座房，圖8變爲五間獨立的扮戲樓，與今日故宮所存暢音閣戲臺、扮

34　參見郭黛姮、賀艷著：《圓明園的「記憶遺產」——樣式房圖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442；郭黛姮、賀艷著：《深藏記憶遺產中的圓明園——樣式房圖檔研究》（三）（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6年），頁154。

35　參見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樣式雷圖檔：圓明園卷初編》第五函，頁12。此圖由中山大學圖書館張紅女史代攝（下同），謹致謝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戲樓的平面結構一致。而圖7則與之相異。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今日所存清代乾隆至道光時期若干同樂園平面圖所示，[36]看戲樓東西兩側的配房，其高度，與看戲樓、戲臺、戲臺南面的後樓是相去不遠的，而《四十景圖》所繪，與平面圖也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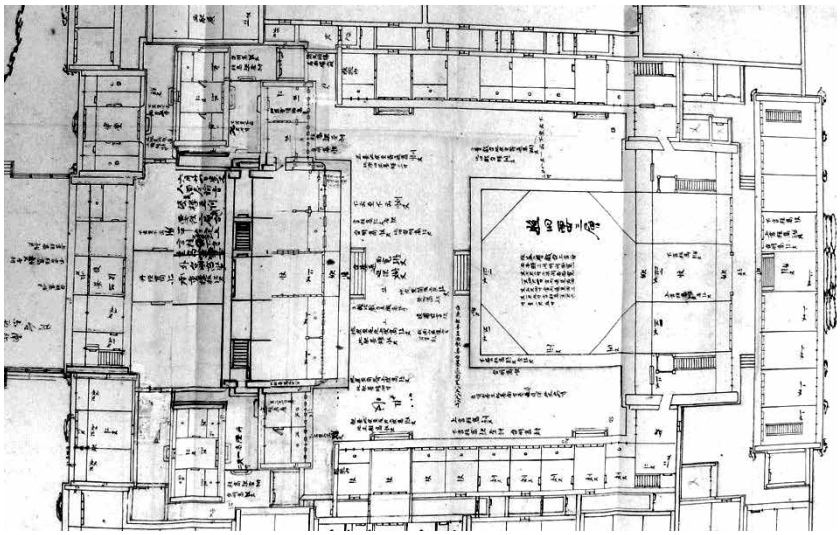


圖9，道光十八年奏准「同樂園地盤准樣」[37]

根據圖8可以得知：

（1）看戲樓（「同樂園」殿）「下簷柱高八尺五寸，上簷柱高七尺五寸，承重樓板厚一尺二寸，通柱高一丈七尺二寸」，「臺明高一尺九寸」，總高：一丈八尺三寸；

（2）東西轉角配房二座各十四間，「下簷柱高八尺，下簷柱高七尺二寸，承重樓板厚一尺，通柱一丈六尺一寸[38]」，「臺明高九寸」，總高：一丈七尺二寸；

（3）扮戲樓「下簷柱高一丈三尺八寸，上簷柱高一丈一尺六寸」，通柱高「二丈五尺四寸」，「臺明高九寸」。總高：二丈六尺三寸。

與此相應，圖9所標：

36 同前註，頁11-17。

37 同前註，頁14。

38 按，「一丈六尺一寸」，應爲「一丈六寸二寸」之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看戲樓的高度，即：「正婁〔樓〕地皮至脊，通高二丈八尺三寸，比原舊正婁〔樓〕矮三寸」；

（2）東西轉角配房「上言〔簷〕柱高七尺二寸，下言〔簷〕柱高八尺」「臺明高九寸」，總高一丈六尺一寸，如果算上承重樓板的厚度（一尺），與圖8是一致的；

（3）扮戲樓「下言〔簷〕柱高一丈三尺五寸，上言〔簷〕柱高一丈一尺六寸」。

由此看，如果說圖9中所標看戲樓、扮戲樓的相關尺寸是擬修數據，那麼東西轉角配房的高度，可謂是保持著舊有的狀貌，並沒有變化。而且，看戲樓、配房的高度（分別高約6.86m、約5.50m）差，在圖6、7已然被直觀展現。這表明，《四十景圖》中同樂園建築的高低狀況，是與實況相符的。再具體審視，《四十景圖》同樂園中的戲樓，其高度與看戲樓、戲樓南面的五間房基本上處於同一水平面，而略高於東西轉角配房所在水平面；看戲樓北面連接的穿堂、後樓高度，則與最南面的三開間後樓相近，均低於戲樓最高點所在的水平面。不但如此，《四十景圖》中其他景點的建築高低，也同樣具有這一特性。[39]這都表明：畫家當時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對這些建築作「寫實性」繪製的。因此，如果當時同樂園中的戲樓是三層大臺（如熱河、紫禁城內的三層臺），無論是採用散點透視還是焦點透視繪畫，其效果應如「清音閣凱宴將士圖」、「阮光顯覲見賜宴圖」，而非《四十景圖》中所呈現的效果——戲樓高度與看戲樓、戲臺南面後樓處於相近的水平面。

其二，若想更爲清楚地理解《四十景圖》中同樂園戲臺的高度及其形制，我們還可以用現存昇平署（南府）戲臺、重華宮漱芳齋戲臺作爲參照：

[39] 如「九州清晏」、「鏤月開雲」、「天然圖畫」、「慈雲普度」、「上下天光」、「茹古涵今」、「武陵春色」、「月地雲居」，等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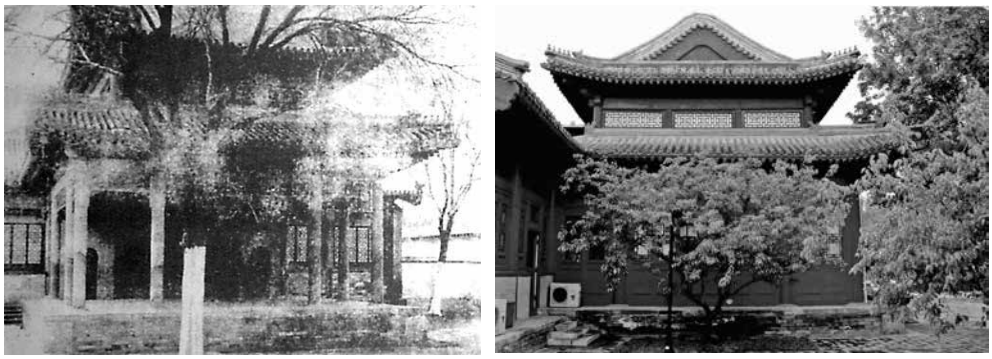


圖10、11，昇平署（南府）戲臺[40]



圖12，漱芳齋戲樓[41]

正如昇平署戲樓、漱芳齋戲樓所示，我們可以比較直觀地、清楚地看見其「橫披窗」，其形制正與《四十景圖》中「同樂園戲臺」的「橫披窗」一致。而且，如圖6、7所示，此時「同樂園」戲臺東、西、北三面沒有擎簷柱，這與圖10、11、12所示也一致。此外更重要的是，三者在整體建築群中的位置、高度也是近似的。這意味著，《四十景圖》中的「同樂園」戲臺，不應是「外顯三層」的戲臺，而應是「重簷單層」戲臺，其可供演員正常行動的舞臺，只有一層，它與南府戲臺（圖10、11）、重華宮戲臺（圖12）的形制應是一致的。

至此，我們便可理解：「外顯三層」的說法，應該是注意到了「雍正間」或

[40] 引自麻國鈞：《中國古代皇家戲臺（四）》，《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頁73、74。按，戲臺今存於原北京第161中學內。

[41] 轉引自趙雯雯、劉暢、蔣張《漱芳齋》，《紫禁城》2009年第5期，頁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乾隆初年」出現「三層」大臺的舊說，與《圓明園四十景圖》所呈現的戲樓形制（「重簷單層」）之間的矛盾，而爲了調和這個「矛盾」，才選擇了近乎「折中」的判語——「外顯三層」。但這種說法，顯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不但如此，我們還可從《活計檔》所記「同樂園」戲臺舊有匾額的數量，疑其並非三層臺。根據現存清代所建的其他三層大戲樓的匾、對佈局，以今日北京故宮中「暢音閣」大戲樓的匾、對位置爲參照，我們很難安置同樂園戲樓的四面匾額，何況其中三面是「小匾」，而「暢音閣」卻有三面大匾[42]：「壺天宣豫」、「導和怡泰」、「暢音閣」。如果此時同樂園戲樓爲三層，且第一層掛有一面「大匾」（當即「景物常新」匾），則其餘三面小匾，又如何安置？無疑是個難題。這就需要我們對後來的同樂園三層大戲臺上的匾、對數量及其懸掛位置，作進一步參考。而這些信息同樣提示我們，《四十景圖》中的同樂園戲臺並非三層臺：

> 乾隆三十年六月初十日，催長四德、筆帖式五德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同樂園大戲臺上現掛漆匾對，俟駕幸熱河，著持出收拾。欽此。
>
> 於本月十三日，催長四德、筆帖式五德將戲臺上黑漆金字對三付、匾三面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傳旨：著找補地杖從漆見新，金字罩漆，其舊字刮金鎔化。欽此。
>
> 於九月二十一日，催長海升將黑漆匾、對三分持赴同樂園掛訖。於十一月初十日，催長四德、筆帖式五德將刮下金土匯總鎔化得九成金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油木作）

很顯然，乾隆三十年同樂園三層戲樓懸掛的是三匾、三對聯，即一層一匾對。如果《四十景圖》或者乾隆二年前後「同樂園戲臺」已然爲三層臺，而其匾、對數量卻是四匾、一對聯，難免有些不合常情——無法將這個數量的匾、對安置於三層建築。

那麼，既然乾隆九年《四十景圖》定稿之時，同樂園戲臺尚非三層，而《活計檔》又提及四面匾額，則除大匾「景物常新」之外，其餘三面小匾懸掛情形如何？雖然乾隆初年的《活計檔》記錄同樂園戲臺、重華宮戲臺所設之「門」衆多，但多半是根據所演故事的需要而臨時設置的：

> 乾隆三年五月初五日，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重華宮戲臺上

[42] 「大匾」，應即所謂「簷內匾」或「簷下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橫楣、欄桿，油雙桃紅色；再，佛門、昇天門、轉輪門，具照同樂園戲臺上門油飾之樣，用灰布、麻油飾，其昇天門上下油五色樣雲，轉輪門上下油烏雲，其餘俱油飾見新，先畫樣呈覽，準時，再油做。欽此。
>
> 於本月初八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將做得重華宮戲臺上轉輪門銅字匾一面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其酆都門、昇天門、雷音寺匾，每樣做二面，其餘之匾俱做一面；再，靈霄門之字另寫。欽此。
>
> 於本月二十一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將做得臺門彩畫木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佛門、昇天門，著漆押條角柱，其餘照樣准做。欽此。
>
> 於本年八月初二日，催總六達子將做得戲臺上昇天門等處匾俱懸掛，並戲臺上所應油飾之處，俱各油飾彩畫完訖。（漆作）

這其中，「佛門」是比較固定的出入通道，因爲乾隆間內府五色套印本《勸善金科》第二本第一出科介文字有「佛門上掛靈霄門匾」、第三本第一出科介中有「佛門上換雷音寺匾」的記錄，都可以說明「佛門」[43]與「上、下場門」一樣，也是相對固定的出入口，只不過它上面的匾額可以因境而換，因而所謂「靈霄門」、「雷音寺」都是匾名，並非另外的門道。其具體形製，或即如下文圖15、16中圓拱形廟門。與此相類似，《勸善金科》第三本第十二出「高僧施法度焰口」的科介記錄有：「從上場門上，至酆都門作迎候科。雜扮鬼王帶套頭……從酆都門上……從右旁門上……」由此可知，「上場門」、「酆都門」、「旁門」，不是一個通道口，「旁門」或是「佛門」左右兩邊的門（如今日昇平署、漱芳齋、純一齋戲臺正中央所設，亦參見圖15、16），而所謂的「酆都門」，與「昇天門」一樣，也是臨時添設的，如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乾隆間鈔本《昇平寶筏》[44]第一本第一齣「轉法輪提綱挈領」舞臺提示曰：「場上預拆靈霄門、昇天門、酆都門科；場東、西側安設昇天門、陟仙門幃幙；中場設火山切末……雜扮八靈官，各戴紮巾額、紮靠、穿戰靴、掛赤心忠良牌、持鞭，從昇天門、陟仙門上，跳舞、鳴爆竹、鞭科，仍從昇天門、陟仙門下，場上隨撤靈霄門幃

---

43 「佛門」，或曰即戲臺正中通往後臺的門，位於上、下場門之間。參見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頁244。

44 按，中之島圖書館藏《昇平寶筏》（索書號：甲漢-332）已經彩印出版，參見磯部彰編著：《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昇平寶筏〉》（仙台：東北大學出版會，2013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幙。」[45]由此，明確可知「酆都門」、「昇天門」等都是臨時所設門道之名，其相應匾額懸掛的位置，自然是臨時設的門。[46]「轉輪門」，也當如「昇天門」、「酆都門」，亦屬臨時所設之門，而非固定性出入通道。而「旁門」上方，《勸善金科》、《昇平寶筏》等大戲中，未見有匾額出現。因此，這些臨設之門的匾額，不會長時間留在戲臺上，而是臨場懸掛。

而「佛門、昇天門、轉輪門，具照同樂園戲臺上門油飾之樣」云云，恰恰又表明二者的舞臺設備基本一致。如此，前文所引史料中同樂園戲臺上「舊有」的四面匾，則只能是固定位置懸掛的匾，而不是諸如「昇天門」等可以臨時更換的匾額。其佈置的具體位置、懸掛情形，或即如今日漱芳齋院落中的戲臺（見圖13），以及位於什剎海西岸的恭王府戲臺（見圖14）——懸掛於簷內、上場門、下場門以及臺中央上方。



圖13，故宮漱芳齋院落中的重簷單層戲樓[47]



圖14，北京恭王府戲臺局部[48]

又或如西苑所謂「純一齋」戲臺所懸匾額情形（見圖15），如圖15所示，下場門門楣處尚可隱約得見懸匾一面，則其上場門相應之處也當懸匾一面。如此，清末「純一齋」戲臺上的匾額共有五面：佛門、上下場門匾及上下層簷匾。其中，上層簷內匾「鈞天普慶」的款式與首簷簷內匾「歌舞昇平」不類，或非康乾間原物。而圖16所示，至民國三十年代，佛門、上下場門上已無匾，則其大概在

45　參見磯部彰編著：《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昇平寶筏〉》，頁7。

46　關於戲臺上演戲時臨時所設門匾、改換情況，還可參看：乾隆間內府五色套印本《勸善金科》第二本第一齣、第三本第一齣、第六本第四齣等；戴雲：《〈勸善金科〉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62-164。

47　參見陸成蘭、趙清波：《漱芳齋摭零》，《紫禁城》2008年第1期，頁108。

48　轉引自麻國鈞《中國古代皇家戲臺（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民國初期被摘除。



圖15，南海「純一齋」戲臺，清末照片[49]



圖16，南海「純一齋」戲臺內部，1930年代齊如山拍攝[50]

總之，乾隆十年之前同樂園戲樓的形制已經清楚。至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則又諭令將「同樂園」戲臺上的對聯，照重華宮戲臺的樣子改做：

---

49 按，此照片爲美籍捷克人Enrique Stanko Vráz (E · ST · Vráz，1860-1932）拍攝於1901年間，藏於捷克Náprstek Museum（納普斯特克博物館），庫藏編號：As/7162。該館1943年以後成爲捷克國家博物館的一部分。本文轉引自捷克「國家博物館」之「電子化館藏 · 文化遺產在線」網站：https://www.esbirky.cz/hledat/fond/4628828，查閱日期：2020年10月7日。

50 北平國劇學會編：《國劇畫報》第二卷、第十四期（1933年4月20日），收入《國劇畫報》（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頁2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乾隆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同樂園戲臺上對子不好，著照重華宮戲臺上對子樣改做。欽此。（木作）

但這依然不意味乾隆十四年左右或稍後，同樂園戲臺已經改建成三層（詳見後文）。因爲，直到乾隆十八年，「同樂園」中的戲臺規制，仍舊是「重簷單層」式：

> 乾隆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員外郎白世秀爲重華宮戲臺上滑車軸子、同樂園戲臺上滑車軸子，因年久磨壞，不堪應用，請欲另換應用等語，啓怡親王准行。遵此。回明內大臣海望、承恩公德保、乾清門侍衛永興、員外郎西寧、達子准行。記此。（記事錄）

這條史料並不將重華宮戲臺、同樂園戲臺上滑車軸子的形制、數量作細緻的統計與區分，則表明二者所用滑車數量、形制應當一致，則二者的舞臺形制也應當是一致的。

四、「同樂園」三層大戲臺的建立

而與此同時，筆者注意到，乾隆五年至乾隆十三年的《活計檔》中，已無「同樂園戲臺」的相關信息。乾隆十四、十八年，則兩次提及「同樂園戲臺」（見前文所引），這似乎表明當時乾隆帝已有意要改建同樂園舊有的重簷戲臺，而其正式動工改建的時間，稍晚於熱河所建三層大戲臺，應在乾隆二十一年二月間：

> （1）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六日，太監董五經來說首領桂元交：御筆宣紙「同樂園」匾文一張、御筆宣紙對文一副；御筆宣紙「蕙氣清陰」[51]匾文一張、御筆宣紙對文一副；御筆宣紙字條一張、御筆宣紙對文一副；御筆宣紙字條一張、御筆宣紙對文一副，傳旨：交安寧織做緙絲。欽此。
>
> 於八月八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蘇州織造瑞保送到緙絲匾文二張、對四副、字二張，各隨宣紙本文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著按原處貼落，其「雙鶴齋」字條一張、對一副，另做一塊玉壁子，其餘用

[51] 按，此爲圓明園「春雨軒」匾額。參見于敏中等編纂：《欽定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八十一，頁13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舊壁子。欽此。（行文）[52]

（2）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奴才三和、五德、倭赫謹奏，爲請旨事。明春聖駕南巡後，所有園內水法工程、同樂園大戲臺，並靜明園等處工程，應需工料銀兩，奴才等查圓明園庫現存銀兩無幾，不敷各工應用，請或向廣儲司，或向滄州處，領取銀二十萬兩，以備各工應用。謹此請旨。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具奏，奉旨：向廣儲司領取。欽此。[53]

據此，我們可以較爲明確地得知：乾隆二十一年，玉泉山的「靜明園」[54]之外，圓明園也在興建工程，其中包含「園內水法工程」、「同樂園大戲臺」，而早在本年二月清高宗已經題寫好「同樂園」等匾對，八月初匾對基本完工。彼時圓明園銀庫不敷應用，而次年春天乾隆帝將要南巡，[55]故臣工在此之前請示乾隆如何應付銀兩撥用之事。如果我們再往前追溯，則早在乾隆五年時，清高宗即對「同樂園」匾的掛置有所不滿：

乾隆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傳旨：將「同樂園」匾釘著換銅鍍金匾釘，嗣後凡屋內有掛之匾，具做銅鍍金匾釘。欽此。

於本年五月初四日，催總白世秀將做得銅鍍金匾釘持去同樂園換訖。（鍍金作）[56]

由此可知，此清高宗對「同樂園」匾額所用匾釘並不滿意。綜合觀之，可以確定：乾隆二十一年之前的「同樂園」園匾，確非乾隆手筆，而前文所謂「同樂園戲臺」舊有的匾對，自然也不是清高宗御筆。故至乾隆二十一年改建「同樂園」大戲臺等工程時，順便將舊「同樂園」園匾、對聯一併換作高宗御筆。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上文三和等人的奏摺明確使用了「同樂園大戲臺」一詞，而非此前敘述時採用的「同樂園戲臺」。這是此前研究者所不曾措意的地方。因爲，與「大」相關聯而必須注意的，是領取「銀二十萬兩」。這批銀兩在

5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21冊，頁762-763。

53 《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上冊），頁85。

54 據研究，此時「靜明園」工程，大概是指修建香山引水石槽，以及開拓高水湖、養水湖，園內修建涵漪齋建築群。參見張寶章：《三山五園》（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頁162。

55 即乾隆二十二年正月癸卯自京師出發，至四月，爲清高宗第二次南巡時間。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16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4。

5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9冊，頁4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圓明園「水法工程」、「靜明園」、「同樂園大戲臺」上具體如何分配，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得知，但從乾隆十五、六年間搭建「臨時性」三層大戲臺看，即使不計戲樓之外的配套設施（如絞盤等）所費，單單搭建這座大戲樓的所需銀兩，已耗用兩千多兩：

> 辦造壽安宮大戲臺一座，計三層，通面寬四丈、進深四丈、臺幫高五尺六寸，通高三丈五尺七寸，內：下層後廊仙樓三間；前臺開地井七座；中層臺各顯三間，開天井七座；上層臺開天井五座。三面俱安琵琶欄杆。兩邊遊廊二座，計十間，各面寬七尺、進深五尺，柱高八尺，臺幫高五尺，安橫楣欄杆。並成做逐日更換四脊攢尖綵頂骨子四十塊、松棚骨子四十塊、盆脊骨子八塊、博脊骨子六塊、箍頭脊骨子六塊、四平八穩博脊綵骨八塊、西洋式鼓棚骨子十一塊、新做衛綵三十二扇、改做衛綵四十九扇、做連二大燈四對……
>
> 計開：搭做大戲臺一座，計三層，每層計三間；遊廊二座，計十間。實用物料銀一千一百八兩七錢二分二厘、工價銀一千四百四十四兩八錢五分八厘。添做壽山十塊、山子踏垛四塊，九層踏垛一分，雲踏垛二塊……
>
> 共銀一萬六千四百三十八兩九錢九厘。內除：回殘物料值銀七百六十五兩四錢一厘外，淨實用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五錢八厘。[57]

據此可知，僅大戲樓本身的搭建，已需銀兩二千五百五十三兩五錢八分（包括物料銀、工價銀）。而乾隆二十五、六年，爲預備崇慶皇太后七十大壽，在壽安宮修建「持久性」的三層大戲臺所耗銀數，也可表明三和等人奏摺中所述「同樂園大戲臺」工程，是改建成「三層」大臺，而非簡單地對舊戲臺進行普通翻修：

> ……海墁甬路、散水，以及油飾、彩畫、糊裱，出運渣土、拉運物料等項工程，除銀朱、苧布、杉木、銅錫、紗絹、高麗紙，向該處行取應用外，所有買辦木石磚灰、琉璃瓦料、紅土繩麻、釘鐵雜料、給發各作匠夫工價運價，通共需銀八萬五千三百九十四兩八錢五分五厘。內除本工拆得舊木石磚塊琉璃瓦料，抵用銀九千八百三十七兩三錢五分八厘外，淨約需銀七萬五千五百五十七兩五錢二分七厘。[58]

---

57 參見《壽安宮搭做大戲臺銷算銀兩總冊》，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內務府奏案》第73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年），頁25-28。

58 傅惜華藏《內務府皇太后七旬萬壽慶典奏案》，轉自傅惜華：《傅惜華戲曲論叢．清宮內廷戲臺考略》（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頁154；按，此三層臺後在嘉慶四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壽安宮，原稱「咸安宮」，早在乾隆十六年已奉敕改建，以祝崇慶皇太后六十大壽，故此處有「除本工拆得舊木石磚塊、琉璃瓦料」之謂。又因爲有舊的建築材料可用，抵去部分開銷，此大戲樓的建設，實際耗銀七萬五千餘兩。

以此作爲參照，則「同樂園大戲臺」的修建費用（其園內也應有部分舊建築材料可用），自應與此相當。與此相應，後來修護壽安宮三層大臺，雖然涉及「抱柱」、「鋪板」、「地平板」、「樓板」等項目，但費用仍只有「二百九十六兩七錢七分三厘」[59]，也同樣說明所謂「同樂園大戲臺」工程，絕非普通的修護，而應是修建三層大臺工程。不然，如果只是舊戲臺的簡單翻修，耗資尚屬有限（四百餘兩[60]，見下文），不至於耗去數萬兩之多，「二十萬兩」銀數，即使不能以「三分」開來考慮，也可見出當時修建「同樂園大戲臺」的資費，當在數萬兩之上。而若非耗費數萬兩之多，內務府管事之人當不會將其與「水法工程」、「靜明園」等工程並列，更不會出現「不敷各工應用」之謂。

我們由此可知：此時所謂的「同樂園大戲臺」，定非此前的「大戲臺」（即重華宮戲臺模式）；至乾隆二十一年年底，同樂園三層大臺等工程仍未完竣，故需「領取銀二十萬兩，以備各工應用」。如此，此時所謂的「同樂園大戲臺」，與前文所引重華宮戲臺之「大戲臺」之稱呼，顯然不能等同視之。如果我們再輔以內廷其他檔案的記載加以考察，則知「同樂園大戲臺」的改建工程，具體應始於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以後。據《乾隆帝起居注》、《清高宗實錄》所記，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總計十四日），高宗尚侍奉皇太后在「同樂園」早晚膳，並在同樂園「觀燈」。[61]這顯然說明，此時的「同樂園」尚未興工，而本年二月初乾隆帝始傳作御筆「同樂園」匾（見前）。

另外，徵之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間修建壽安宮三層大臺所需時間，以及維修的時間，亦可證「同樂園」三層大臺興建於乾隆二十一年，完工於乾隆二十二年：

拆除，參見肖領弟：《故宮壽安宮的保護與利用》，收入《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四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頁212。

59 原國劇陳列館藏《壽安宮戲臺粘修工程奏銷黃冊》。按，此奏銷無具體年月，應在乾隆朝及嘉慶前。轉自傅惜華《傅惜華戲曲論叢．清宮內廷戲臺考略》，頁154。

60 按，乾隆二十五年八月爲慶祝崇慶皇太后七十大壽，在壽安宮建成持久性三層大戲臺；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奏估維修費用，需銀四百四十六兩七錢八分七厘。

61 分別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15冊，頁12-28；慶桂、曹振鏞等修：《清實錄．高宗實錄》第1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504，頁3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奴才三和、吉慶、四格等奏，爲奏聞約估需銀兩數目事，奴才等遵旨，壽安宮添建三層戲樓一座，四面各顯三間。扮戲樓一座，計五間。東西轉角樓房二座，計三十二間。[62]

（2）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初七日，工程處持來旨意帖一件，內開：三月二十日，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合〕奉旨：壽安宮大戲臺應用雲兜、雲梯、踏跺、帳幔、塔座，具另造一分，應交造辦處盔頭作者會同辦理。欽此。於十月初六日，付催長興德將做得大戲臺雲兜等持赴安訖。於七月初二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寅著爲成做壽安宮大戲臺上大昇雲盤、轉雲遊、雲兜等件所用庫貯物料，並動用造辦處買辦、工飯銀五百十八兩二分零，繕摺持進，交太監胡世傑轉奏，奉旨：知道了，其所做活計具要結實細緻。欽此。於七月初三日，付催總興德將做得錦套一件持進安訖。（皮裁作）

（3）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等奏：「……奉旨：清音閣[63]三層天花板，原非走人之處，因其中路寬，所以著人從內走上天井散蝠、上雲兜、出切末等項，今年久拔縫，以致將人跌傷……此處如此，將壽安宮、同樂園亦應照此詳細查看堅固……奴才等遵即率員恭詣壽安宮，將三層簷戲臺所有走人之處詳細查看……通共估需銀四百四十六兩七錢八分七厘，請向廣儲司領用……」[64]

由此可知，壽安宮「持久性」三層大戲臺，約在乾隆二十五年八月至乾隆二十六年十月間完成建設；與此同時，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已完成「雲兜」等附屬設備的造辦，至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奏銷所費銀兩；其維修時間，則在建成後之第五年（「五年一修」的慣例，見後文）。而壽安宮三層大戲臺的這種種情況，在「同樂園大戲臺」上也一一呈現：

（1）如前文所考，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同樂園大戲臺」建設動工（略）。

（2）與此相關聯，同樂園大戲臺的配套設備，在乾隆二十一年間已經同步

62　傅惜華藏《內務府皇太后七旬萬壽慶典奏案》，轉引自傅惜華《傅惜華戲曲論叢．清宮內廷戲臺考略》，頁153。

63　案，此處「清音閣」指熱河三層大戲臺。

6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內務府奏銷檔》第79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年），頁101-104。按，此摺後面僅提及「壽安宮」三層臺的維修費用，而未提及「同樂園」，則「圓明園」三層臺當是由管理圓明園事務部門負責修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製作：

>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九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大戲臺上應用雲兜、雲幛，今或仍用現有畫色布雲兜、雲幛，或另做堆綾畫色雲兜、雲幛之處，臣等未敢擅專，理合請旨遵行辦理，爲此謹奏請旨，繕摺持進，交首領張玉轉奏，奉旨：准用堆綾成做。欽此。
>
> 於本月十四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做得大臺應用雲兜、雲幛等所需庫貯綾、布、絲、線等項動用造辦處庫項目外，其買辦工價銀二百五十九兩零，仍照例由圓明園工程處領用，俟完時另行查核具奏。所有應用材料銀兩細目，另繕清單，一併呈覽，奉旨：用造辦處錢糧，其餘知道了。欽此。（皮裁作）

雖然遵照清高宗的指示，籌辦大戲臺事項所需錢糧，從「造辦處」支取，但「圓明園工程處領用」一語，顯然說明所謂「大戲臺」，應即圓明園內正在修建的「同樂園」三層大臺。據此，也可知同樂園大戲臺興建的同時，其他配套設備，如「雲兜、雲幛」之屬，也在同時造辦。需要提醒的是，由「皮裁作」提及「材料銀兩細目」，並繕寫了清單，則「同樂園」三層大臺工期似已過半，故臺上「應用雲兜、雲幛」所需數量及「買辦工價銀」，這時均已定下。

（3）五年之後，即乾隆二十六年，同樂園大臺已進入維修階段：

>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郎中白世秀爲同樂園大臺上現用白絲繩四根，因用久糟朽，不堪應用，請添做粗九分、長十二丈白絲繩四根，以備應用，等因，回明王公大人准行。記此。於七月初二日，催長強錫將打得白絲繩四根持赴大臺用訖。（皮裁作）

白絲繩「粗九分、長十二丈」，共需「四根」，則知所用繩索每根長達近40米，而同樂園三層大臺的簷柱總計10.78米。[65]這同樣明確地告訴我們：前引「同樂園大戲臺」，確爲三層大臺；而「用久糟朽」一語，則表明距乾隆二十六年，同樂園大戲臺已經被運用五年（一年一次演出），故曰「用久糟朽」。這種維修期的一致，並不是巧合，而是「五年一修」的慣例：

> （咸豐二年三月十七日）催長增年持來報單一件，內開盔頭作爲呈報事：今因同樂園臺上舊有雲兜、貫板一分，向〔例〕五年一修，今已過年分。

[65] 李建芸：《同樂園復原設計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碩士論文，2001年）。本文轉引自羅德胤《中國古戲臺建築》中所列「表5-1」，頁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又查雲兜、雲板，繩斤磨傷，軟片脫落，不堪呈應，請行更換，爲此先行呈報，等因，呈明總管。記此。（盔頭作呈稿）

據《活計檔》「盔頭作」的呈稿可知，同樂園大戲臺的確也有「五年一修」的慣例。只不過大臺執行「五年一修」具體始於何時，目前尚不清楚（據前文所引壽安宮大臺維修時間，大概在乾隆中期已形成慣例）。[66]但即便如此，「向［例］五年一修，今已過年分……繩斤磨傷，軟片脫落，不堪呈應」云云，表明大臺應用的牽引繩使用年限，應是前後沒有差異的。故此，它仍可以協助我們來判斷同樂園大戲臺的建成時間——乾隆二十二年。

除此之外，同樣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乾隆二十一年四月至三十三年四月內廷檔案所記宮內各處用炭的相關記錄，也同樣表明同樂園三層大臺建立的時間，是在乾隆二十二年：「（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本日南府總管蘭芳傳（旨），同樂園開連臺大戲……正月二十四日，南府總管蘭芳傳旨：同樂園唱連臺節戲……」[67]而相同的檔案中，所記乾隆二十一、二十二年[68]用炭情況，則未見同樂園開連臺大戲、唱連臺節戲用炭的記錄，而自乾隆二十三年之後，乾隆二十四年至三十三年（除卻二十七、二十八年、三十年）每年均於正月十四、

66 按，清廷管理維護內廷建築以及京師公共設施的週期制度，似多以五年一修爲例。如雍正十年四月，內務府滿文奏銷檔曾記載：「臣等曾於雍正九年三月十七日奏准，查得京城內外河道、橋樑、水閘應修之處，曾奏請隔五年修理一次。若於雍正三年修理，今亦已過五年。京城內外河道堵塞，橋樑、水閘均已坍塌。臣衙門會同工部、苑丞查看應修之處，估算所用錢糧，奏請修理等因。奉旨：依議。欽此。」參見《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上冊），頁37。

67 佚名氏：《乾隆添減底帳》，收入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第28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266-276。按，此條信息，承蒙審稿專家惠示，謹致謝忱。

68 按，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分別爲高宗第二、三、四次南巡，故這三年正月間同樂園未照例演戲。而乾隆二十八年，據《清高宗實錄》卷六百七十八所記，自本年正月十四日壬申至二十七日乙酉，「上奉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乙酉皆如之。」而無名氏《乾隆添減底帳》未見記載正月間同樂園用炭，原因應該是「天氣合暖」：「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總管王常貴傳說，正大光明上御筵晏〔宴〕殿內盆火，天氣合暖，不用安火……十六日，正大光明上御筵晏〔宴〕殿內盆火，天氣合暖，不用安火。」而乾隆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又照例用炭：「乾隆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按例御茶房、同樂園茶水上用黑炭十觔、果子上用黑炭五觔、同樂園開連臺大戲火壺用黑炭三十觔。」從「按例」二字看，同樂園開臺大戲用炭量已經成爲慣例，應該在乾隆二十八年以前。分別參見慶桂、曹振鏞等修：《清實錄．高宗實錄》第1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六百七十八，頁591；佚名氏：《乾隆添減底帳》，《歷代日記叢鈔》第28冊，頁2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十四日記有同樂園演出連臺戲的用炭情況。這顯然不是偶然性的現象。因爲這與《清高宗實錄》所記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總計十四天）清高宗已經在「同樂園」侍奉皇太后早晚膳的事實，也相吻合。[69]如此，則同樂園三層大戲臺的具體完工時間，應在乾隆二十二年秋冬間，總計耗時一年左右，與建立「壽安宮」三層大臺所需時間同樣相近。

至此，我們知道了同樂園三層大戲樓的興工、竣工時間，則其並非清代首座三層大戲樓的事實，已無需再作議論。正因爲在其之前有「壽安宮」臨時性三層大臺（乾隆十六年竣工）、熱河持久性三層大戲臺（乾隆二十年七月竣工[70]）等建築實踐，積累了充分的經驗技術，諸如外部形制、聲效設計（包括天井、地井），故其可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完成。

餘論

如前所考，「同樂園」第一次出現三層大臺，乃在乾隆二十二年間。這就爲我們破除了「同樂園大戲臺建於雍正間或乾隆初年」之說帶給研究的最大迷障。

以往涉及同樂園三層戲樓成立時間的著述，以及治理清代內廷連臺大戲曲本的學者，正是因爲沒有解決「三層」大臺先後出現的時間問題，尤其是「同樂園」三層臺的建設時間，因而種種繁難、錯誤纏繞其中，導致諸多的誤判。如研究者或以爲乾隆初年張照（1691-1745）等人奉敕改編《勸善金科》時，「並沒有意識到該劇一定要在三層舞臺上演出。所以，該劇本的舞臺提示中，對演員的行爲動作、服裝化妝、背景砌末等均交代得一清二楚，惟獨對戲臺的結構沒有特別的交代。」[71]其實，我們很難想像諸如張照、允祿等內廷要員，如此欠缺應有的戲曲素養，卻被委以此任；而如果雍正間已然存在三層大戲樓，並且雍正間已經對《勸善金科》作過改編，到乾隆朝再作修改時，反而忽略大戲臺在整個《勸善金科》演出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這於情於理都是無法暢通的。

這些疑難之處，雖然現在有一部分已經渙然冰釋，但由此帶來的新議題，仍

---

69 分別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17冊，頁12-28；《清實錄．高宗實錄》第16冊，卷554，頁13。按，《起居注》亦記曰在同樂園「觀燈」。

70 關於熱河避暑山莊三層大戲樓的修建史，參見拙文《清代三層戲樓的建設史及其相關問題》（待刊）。

71 參見戴雲：《〈勸善金科〉研究》，頁1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待進一步探討。譬如，既然「同樂園」三層大臺已非清代第一座三層臺，我們則有必要重新審視乾隆十六年壽安宮「臨時性」三層大臺的歷史性意義，並需將之提至新的研究視點。又如，鑒於清代三層戲樓出現在乾隆十年之後的事實的考定，早期宮廷連本大戲（如《勸善金科》、《昇平寶筏》等）的產生，及其所屬版本系統等問題，也需要作新的思考，而昭槤《嘯亭續錄》「大戲節戲」條所述張照等人編纂《勸善金科》的情況，也有待作新的審判與解讀。而這些問題只是由此帶來的諸多議題中的典型。

在這些典型的議題中，與本論文最直接關聯的，那就是：由此我們需要重新評估「同樂園」三層大戲臺在清代宮廷演劇史上的地位及意義。「同樂園」三層大臺雖然晚於壽安宮臨時性三層臺、避暑山莊持久性三層臺，並不具備「開創性」的價值及意義，我們又如何看待它的出現？無論如何，「同樂園」三層大戲樓以及其他宮苑大戲臺修建時間的確定，不僅有利於我們對「同樂園」三層大臺的戲劇史（尤其是清代內廷演戲史）的地位作出新的、客觀的評估，也爲我們研討諸如上面所舉諸多議題，提供了堅實的研究基礎。從這個層面講，我們依然不能因爲它的晚出，而忽略或低估它應有的戲劇史地位。當然，其於「圓明園」建築史研究的價值也自當作如是觀。這些都是本論文研究的最終目標與期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圓明園「同樂園」三層戲樓建立新考

彭秋溪
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根據清代內府《活計檔》、《奏案》、《奏銷檔》，以及絹本《圓明園四十景圖》等文獻所記，可知圓明園「同樂園」三層大戲臺並非目前學界所推想的建成於雍正四年或乾隆初年。實際上，「同樂園」三層戲臺的興工，約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間，至乾隆二十二年秋冬間竣工（略晚於熱河行宮大戲臺）。而在此之前，壽安宮已出現臨時性三層大戲臺，熱河也已建成持久性三層大臺，因此，「同樂園」並非三層大戲臺的發源地。但基於「同樂園」三層大臺建設時間的考定，諸如壽安宮臨時性三層大戲臺的戲劇史意義、乾隆朝三層大戲臺興建的熱潮，以及乾隆初年張照等人奉敕編纂《勸善金科》、《昇平寶筏》等大戲曲本、內府編印五色本《勸善金科》等議題，都有重新研判的必要。由此，我們仍然不能忽略或低估「同樂園」三層大臺在清代戲劇史以及「圓明園」建築史研究方面的地位與價值。

關鍵字：圓明園　同樂園　壽安宮　三層戲臺　乾隆二十二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ew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ree-story Theater Stage of "Tongle Yuan" in the "Old Summer Palace"

Qiu-xi PENG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records in the documents of *Huoji Dang*（活計檔）, *Zou An*（奏案）, *Zouxiao Dang*（奏銷檔）—from the Inner Palace of the Qing dynasty—as well as the silk version of *Yuanming Yuan Sishi Jing Tu*（圓明園四十景圖）,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hree-story Theater Stage of "Tongle Yuan"（同樂園）in the "Old Summer Palace" was not constructed in the fourth year of Yongzheng or the early years of Qianlong. In fact, the three-story stage in Tong Le Yuan began to be built approximately in the second lunar month of the 21st year of Qianlong (1756), and was completed between autumn and winter in the 22nd year of Qianlong, a little later than the grand stage in the Chengde Imperial Summer Resort. Before that, there had been a temporary three-story stage in Shou'an Palace（壽安宮）and a perdurable three-story stage in the Chengde Imperial Summer Resort. Therefore, "Tongle Yuan" was not the birthplace of the three-story stage.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certain of these issue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emporary three-story in Shou'an Palace, the boom in the building of the three-story stage during the Qianlong era, Zhang Zhao（張照）and the others with the compilation of *Quanshan Jinke*（勸善金科）and *Shengping Baofa*（昇平寶筏）under order in the early years of Qianlong, as well as the edition of *Quanshan Jinke* compiled by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printed in five colors, in order to judge on the basis of examination and make determination of the time of emergence of the three-story stage of Tongle Yuan. So, we still cannot ignore or underestimate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the three-story stage of Tongle Yuan, for the research on Qing dynasty drama history and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Old Summer Palace".

Keywords: Old Summer Palace　Tongle Yuan　Shou'an Palace
Three-story Theater Stage　the 22nd year of the Qianlong er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丁汝芹：《清代內廷演戲史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_____：《清宮戲事：宮廷演劇二百年》，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年。

_____：《清代內廷演劇始末考》，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年。

于敏中等編纂：《欽定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_____：《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合編：《清宮內務府奏銷檔》第79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年。

_____：《清宮內務府奏案》，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年。

中國紫禁城學會編：《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六輯（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王子林：《乾隆潛邸改建考》，《故宮學刊》2010年（總第6期），頁183-208。

王道成：《概說圓明園四十景探微》，《圓明園》學刊第18期，頁1-4。

北平國劇學會編：《國劇畫報》，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李建芸：《同樂園復原設計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碩士論文，2001年。

李雪：《圓明之德——〈圓明園四十景圖〉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4年。

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肖領弟：《故宮壽安宮的保護與利用》，收入《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四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佚名氏：《乾隆添減底帳》，收入李德龍、兪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第28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十年論文選（2005-2014）》，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年。

兪健：《清宮大戲臺與舞臺技術》，《藝術科技》1999年第2期，頁8-16。

郝成文、張義：《圓明園戲臺考》，《北京檔案》2019年02期，頁53-56。

郭黛姮：《遠逝的輝煌：圓明園建築園林研究與保護》，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年。

郭黛姮、賀艷：《圓明園的「記憶遺產」——樣式房圖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_____：《深藏記憶遺產中的圓明園——樣式房圖檔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6年。

陸成蘭、趙清波：《漱芳齋摭零》，《紫禁城》2008年第1期，頁106-115。

張衛東：《賞花有時度曲有道：張衛東論崑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龍、吳晗冰、張芝明、張鳳梧：《圓明園同樂園清音閣戲樓鈎沉——兼論清宮三層戲樓的空間使用特徵及其成因》，《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9期，頁54-63。

張寶章：《三山五園》，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

常欣：《紫禁城內的戲臺》，《紫禁城》2013年第11期，頁34-46。

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樣式雷圖檔：圓明園卷初編》第五函，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

麻國鈞：《中國古代皇家戲臺（四）》，《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頁73-76。

彭秋溪編著：《清代內務府〈活計檔〉中的戲曲史料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預計2025年出版。

傅惜華：《傅惜華戲曲論叢．清宮內廷戲臺考略》，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

葛兆光：《朝貢、禮儀、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易服色說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2期，頁1-11。

楊連啓：《清末宮廷承應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2年。

_____：《清代宮廷演劇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7年。

趙雯雯、劉暢、蔣張：《漱芳齋》，《紫禁城》2009年第5期，頁26-32。

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____：《中國古代劇場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

劉玉文：《濃縮天地：避暑山莊營造技藝》，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劉敦楨：《劉敦楨文集》（一），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年。

慶桂、曹振鏞等修：《清實錄．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6年。

磯部彰編著：《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昇平寶筏>》，仙台：東北大學出版會，2013年。

戴雲：《〈勸善金科〉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羅德胤：《中國古戲臺建築》，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